社会排斥与自尊: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和内隐人格观的调节作用

雷玉菊1,2,杨秀娟2,周宗奎2,窦刚1,谢岭1

(1.湖北文理学院教育学院,襄阳441053;2.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武汉430079)

【摘要】 目的:探讨社会排斥和自尊的关系,应对方式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内隐人格观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青少年社会排斥量表、自尊量表、内隐人格观量表及应对方式量表,对657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社会排斥和自尊显著负相关;(2)社会排斥不仅能够直接预测自尊,还能通过不同的应对方式间接作用于自尊;(3)个体的内隐人格观水平能够调节社会排斥与积极应对之间的关系,对于倾向于持增长内隐人格观的个体,社会排斥对积极应对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对于倾向于持实体内隐人格观的个体,社会排斥对积极应对的预测作用不显著。结论:应对方式在社会排斥与自尊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内隐人格观在社会排斥与积极应对之间起调节作用。

【关键词】 社会排斥; 应对方式; 自尊; 内隐人格观

中图分类号: R395.6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20.03.029

Association between Ostracism and Self-esteem: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ping Style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mplicit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LEI Yu-ju^{1,2}, YANG Xiu-juan², ZHOU Zong-kui², DOU Gang¹, XIE Ling¹
¹School of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 of Art and Science, Xiangyang 441053, China;
²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ostracism and self-esteem,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ping style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mplicit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on this relationship. Methods: A survey research method was conducted in which the Inventory of Ostracism Experience scale for Adolescents,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the Self-Esteem Scale as well as Implicit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were administered to 657 high school students. Results: Ostracism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esteem. Coping styles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stracism and self-esteem. Furthermore, the implicit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moderated the relation between ostracism and positive coping, with a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for the group with higher level of implicit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Compared with the adolescents holding entity theory, the individuals holding incremental theory used more positive coping to low ostracism. Conclusion: Ostracism influences self-esteem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ping styles, while adolescents' implicit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can alleviate it's detrimental effect.

[Key words] Ostracism; Coping Styles; Self-esteem; Implicit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社会排斥(Ostracism)指被个体或群体拒绝接纳、忽视或被贬低的现象,是一种消极的人际经历,不仅会威胁个体的自尊、归属感、控制感和存在意义,还会引发一系列痛苦体验[1.2]。尽管人的一生都可能遭遇社会排斥的威胁,但在青少年时期遭遇社会排斥的风险更大,青少年更易受到同伴群体的影响,他们对被忽视和排斥更敏感[3.4]。因此,与儿童和成人相比,社会排斥对青少年的威胁更大[4-6]。Saylor等[7]研究证实,社会排斥是一种冷暴力,对青少年的威胁比欺负更甚,会严重威胁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自尊,作为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19Q158)的 资助

通讯作者:雷玉菊,E-mail: leiyuju0903@163.com

的核心指标之一^[8],极易受到社会排斥的威胁^[9,10]。 社会排斥的需要一威胁时间模型^[1]、社会计量器模型^[10]均有力地证实了社会排斥会威胁自尊,然而,对于社会排斥威胁青少年自尊的过程和机制,我们还不甚明确,是否存在因素在其中发挥中介或调节作用?

根据一般压力理论(the general strain theory)[11],社会排斥是一种重要的压力源,会引发个体一系列的适应性问题,而应对方式在二者的关系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12,13]。应对方式是个体在面对压力时所采用的认知调节和行为努力的策略与方法,分为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14]。积极应对,指个体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主动寻求内外部资源,积极构建解决问题的策略;而消极应对,是指相对于问题解决,个体更关注自己的情绪体验,采用逃避、否认、幻想等

方式[15,16]。一方面,不同的应对方式会对个体的自 尊产生不同影响[17,18]。如有研究发现,积极应对与 青少年自尊水平显著正相关,而消极应对则与青少 年自尊水平显著负相关[18]。另一方面,青少年不同 应对方式的选择可能受环境因素的影响。如研究发 现,在面临高水平的外界压力时,青少年更倾向于采 用消极应对[19],有过童年创伤经历的个体更少地采 用积极应对[20]。社会排斥对于青少年而言是一种典 型的消极生活事件,因此可能与积极应对显著负相 关,而与消极应对显著正相关。此外,还有研究进一 步表明,应对方式在消极生活事件与个体心理社会 适应之间起中介作用[17-20]。研究发现,消极应对方 式在受欺负经历与个体自尊之间起中介作用四,而 积极应对方式在童年创伤经历与个体幸福感之间起 部分中介作用[20]。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在社 会排斥对自尊的影响中,应对方式起中介作用。

身处同样的社会排斥情境为什么有些人颓废,有些人却依然朝气蓬勃;有些人能够采用积极的方式应对,缓解社会排斥的消极影响,有些人却采取消极的方式应对,加剧社会排斥的消极影响?压力转换模型(the transactional model of stress)指出,应对方式不仅受压力事件的影响,也受个体特质的影响,是情境与个体特质共同起作用的结果[21,22]。因此,在压力事件(社会排斥)对应对方式的影响中,个体特质可能起着调节作用。

近年来,内隐人格观在压力应对中的作用逐渐 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内隐人格观是个体对人格特质 的可塑性持有的信念,包含两种:实体观(entity theory)或增长观(incremental theory)[23]。这种信念会一 定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人的行为的理解和反应方 式。持实体观的个体认为人的特质是稳定的,不可 改变的,常对事件进行宽泛概括化、静态不可变的认 知解释;持增长观的个体认为人的特质是可塑的,能 较全面地对事件进行灵活的、发展视角的认知解 释。已有研究证实,在社交领域,内隐人格观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解释不同个体面临社会排斥和欺负时的 不同反应[24,25]。Yeager 等(2011)[24]研究发现,实体观 者会认为排斥行为实施者具有不良且不可改变的人 格特质,因而他们倾向于采用"报复回去"的消极策 略来应对排斥行为实施者;而增长观者并不武断地 对排斥行为实施者的特质下结论,他们会考虑影响 个体行为的内外调节因素,倾向于采用积极的方式 来应对。社会信息加工模型(the soci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也指出个体对人际冲突事件的认 知解释也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应对^[26]。实体观者倾向于对人际冲突事件进行敌意性归因,采用更多的消极策略来应对社会排斥或者欺负行为。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内隐人格观会调节社会排斥和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

基于社会排斥的普遍性及消极影响,有必要探讨社会排斥影响青少年心理适应的作用机制,以期为制定社会排斥的干预或预防措施提供实证上的借鉴。本研究立足于青少年的同伴关系,重点关注青少年体验到的社会排斥与其自尊的关系,并进一步检验应对方式在这一关系中的中介作用以及该中介作用是否受到青少年所持的内隐人格观的调节。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青岛市某高级中学高一、高二两个年级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690份,回收整理后得有效问卷657份,有效率为95.22%。其中男生340人(51.75%),女生317人(48.25%);被试的年龄在15-17岁之间(M=16.65;SD=0.57)。调查在获得学生知情同意的情境下收集。采用纸笔测验进行,测验情境包含一名研究者和一名老师。

1.2 研究工具

- 1.2.1 社会排斥 采用青少年社会排斥量表(Ostracism Experience scale for Adolescents, OES-A)的中文版^[27],测量青少年的社会排斥经历。该量表包含被忽视和被拒绝两个维度,共11个项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方式(1=从来没有,5=经常)。得分越高表示经历的社会排斥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9。
- 1.2.2 自尊 采用Rosenberg 自尊量表的中文版^[28],测量青少年的自尊状况。该量表共有10个项目,采用Likert 4点计分方式(1=非常不符合,4=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自尊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
- 1.2.3 应对方式 采用姜乾金^[28]编制的应对方式量表,衡量青少年在压力环境下的应对方式,共20个项目,消极应对方式、积极应对方式各10个项目。采用Likert 5点计分(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本研究中消极应对方式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75,积极应对方式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0.79。
- 1.2.4 内隐人格观 采用Levy等内隐人格观量表的中文版本[29]。该量表共8个项目,实体观、增长观各4个,Likert 6点计分方式(1=非常不同意,6非常

同意)。实体观采用反向计分方式,得分越高持增长观,得分越低持实体观。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为 0.78。

1.2.5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设定公因子数为 1,采用 Amos 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拟合指数如下: χ^2/df =12.25, SRMR=0.08, GFI=0.89, CFI=0.83, NFI=0.81, RMSEA=0.09,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 结 果

2.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由表1可知,主要研究变量(社会排斥、内隐人格观、应对方式和自尊)之间的关系总体符合本研究假设。其中,社会排斥与自尊显著负相关;内隐人格观与积极应对显著正相关,与消极应对显著负相关;积极应对与自尊显著正相关,消极应对与自尊显著负相关。

表 1 网络社会排斥、内隐人格、应对方式与自尊的相关分析

	M	SD	1	2	3	4	5	6	7
1.性别	-	-	-						
2.年龄	16.65	0.57	-	1.00					
3.社会排斥	2.47	0.73	-0.06	-0.01	1.00				
4.内隐人格	2.97	0.83	0.01	0.04	-0.05	1.00			
5.积极应对	3.31	0.59	-0.02	-0.01	-0.18**	0.13**	1.00		
6.消极应对	3.19	0.67	0.07	-0.04	0.32***	-0.17**	-0.32***	1.00	
7.自尊	2.94	0.55	-0.02	0.02	-0.39***	0.07	0.33***	-0.43***	1.00

注:N=657,性别为虚拟变量(0=男,1=女),**P<0.01,***P<0.001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下同。

2.2 中介效应检验

将所有变量做标准化处理,使用Hayes^[30]的SPSS宏程序PROCESS,分析应对方式在社会排斥与自尊之间的中介作用(Mod4)以及该中介作用的前半段是否受到内隐人格观的调节(Mod7)。

应对方式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2。社会排 斥对自尊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0.40, 95%的置 信区间为[-0.47, -0.33], P<0.001); 且当纳入应对方 式后,该直接作用仍然显著(β=-0.27,95%的置信区 间为[-0.34, -0.20], P<0.001), 社会排斥显著负向预 测积极应对(β=-0.19, 95%的置信区间为[-0.26, -0.11], P< 0.001), 积极应对显著正向预测自尊(β= 0.19,95%的置信区间为[0.12,0.26],P<0.001);社会 排斥显著正向预测消极应对(β=0.33, 95%的置信区 间为[0.25, 0.40], P<0.001), 消极应对显著负向预测 自尊(β=-0.27, 95%的置信区间为[-0.35, -0.20], P< 0.001)。此外,积极应对、消极应对的中介效应的 Bootstrap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表明积极应对、 消极应对在社会排斥与自尊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且消极应对的中介效应大于积极应对的中介效应。 总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32.5%,间接效应值-0.13, Bootstrap95%置信区间[-0.17, -0.09]; 积极应对的间 接效应占总效应的10%,间接效应值-0.04,Bootstrap95%置信区间[-0.07, -0.02];消极应对的间接效 应占总效应的 22.5%,间接效应值为-0.09, Bootstrap95%置信区间[-0.13, -0.06]。

表2 积极应对策略、消极应对策略的中介效应分析

回归	整体	本拟合	指数	回归系数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自尊	社会排斥	0.40	0.16	41.93	-0.40	-11.18***
积极应对	社会排斥	0.19	0.03	8.11	-0.19	-4.89***
消极应对	社会排斥	0.34	0.11	28.21	0.33	8.92***
自尊	社会排斥	0.54	0.29	53.66	-0.27	-7.81***
	积极应对				0.19	5.47***
	消极应对				-0.27	-7.56***

2.3 调节作用检验

内隐人格观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见表3、4。将内隐人格观纳入模型后,社会排斥与内隐人格观的交互项对积极应对的预测作用显著(β=-0.08,95%的置信区间为[-0.15,-0.01], P<0.05),对消极应对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1,95%的置信区间为[-0.05,0.08], P=0.71),说明内隐人格观在社会排斥与积极应对之间起调节作用。且当内隐人格观得分的平均数减一个标准差、平均数以及平均数加一个标准差三个水平时,积极应对在社会排斥与自尊之间的中介效应值及其95%Bootstrap置信区间如表4所示。相较于低内隐人格观(M-1SD),个体的内隐人格观较高时(M+1SD),积极应对在社会排斥与自尊之间的中介作用更大(效应值为-0.05)。

进一步采用简单斜率检验来分析内隐人格观在 社会排斥与积极应对之间的调节作用。按照内隐人 格观的平均分加减一个标准差将被试分为高内隐人 格观组(增长观)(M+1SD)、低内隐人格观组(实体 观)(M-1SD)。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考察社会排斥与积极应对方式的关系,结果显示,在高内隐人格观组(增长观),社会排斥对积极应对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B_{simple}=-0.22, t=-2.22, P<0.05);在低内隐人格观组(实体观),社会排斥对积极应对的预测作用不再显著(B_{simple}=-0.06, t=-0.71, P=0.48)。这表明,对于持增长观的个体,受到的社会排斥越多,采用积极应对会越少。且随着社会排斥水平的增高,实体观者与增长观者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差异在逐渐减小。仅在低社会排斥情境下,增长观者比实体观者采用更多的积极应对,而当社会排斥非常严重时,增长观者采用积极应对的概率也在急剧的降低。

表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位	体拟合	·指数	回归系数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积极应对	社会排斥	0.24	0.05	7.79	-0.19	-4.99***
	内隐人格				0.12	3.02**
	社会排斥×内隐人格				-0.08	-2.32*
消极应对	社会排斥	0.36	0.13	32.20	0.32	8.82***
	内隐人格				-0.15	-4.28***
	社会排斥×内隐人格				0.01	0.37
自尊	社会排斥	0.54	0.29	53.66	-0.27	-7.80***
	积极应对				0.19	5.47***
	消极应对				-0.27	-7.56***

表4 不同内隐人格观水平时应对方式 在社会排斥与自尊之间的中介效应

中介变量	内隐	中介	Boot	Bootstrap	Bootstrap
中开文里	人格观水平	效应值	标准误	下限	上限
积极应对	M -SD	-0.02	0.01	-0.05	0.01
	M	-0.04	0.01	-0.06	-0.02
	M+SD	-0.05	0.02	-0.10	-0.02

3 讨 论

本研究重点关注社会排斥威胁自尊的作用过程,探究应对方式、内隐人格观在其中的中介、调节作用。结果发现,青少年遭遇的社会排斥与其自尊呈显著负相关;应对方式在二者的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且积极应对方式中介作用的前半段路径受到内隐人格观的调节。

本研究发现,青少年遭遇的社会排斥与其自尊呈显著负相关,这与以往基于青少年群体的研究结果一致^[2]。这一结果亦表明,社会排斥是自尊的重要风险因素,社会排斥越严重,对自尊的威胁越大。社会排斥的被忽视感和排斥感向青少年传达了一种负性评价,青少年将这种负性评价内化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导致自我价值感和意义感的降低,进而威胁其自尊^[15]。更为重要的是,本研究还发现应对方

式在社会排斥与自尊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一结 果总体支持一般压力理论的核心假设,即应对方式 在压力源(社会排斥)与适应性结果(自尊)之间起着 中介作用[11]。其中,积极应对方式以问题解决为中 心,这种应对策略鼓励青少年尝试识别压力源、积极 主动地寻求策略解决问题,成功的问题解决经历会 提升青少年的自我价值感,进而缓解社会排斥对个 体自尊的威胁四。而采用消极应对策略的青少年在 面对人际压力或人际冲突时,不会直面问题,倾向于 采用逃避或者将问题外化为报复行为或者内化为自 我贬损、自我价值威胁等消极体验四。这种应对策 略不能及时地将问题或冲突解决,从而使青少年感 到挫败,不能很好地实现自我价值感,进而威胁到自 尊水平本研究的结果,证明了一般压力理论的广泛 适用性,也对厘清社会排斥威胁青少年自尊的作用 过程提供了支持,为制定减弱社会排斥的消极影响 的干预策略提供了线索。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社会排斥与积极应对方式 二者之间的关系受青少年内隐人格观的调节。即在 低社会排斥情境下,相较于持实体观的个体,持增长 观的青少年将会更多地采用积极应对方式。这些结 果也验证了压力转换模型的基本观点,即不同人格 特质或素质的个体对压力或者消极经历的应对方式 可能不同四。增长观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特质,是 个体压力应对的保护性因素,能够缓解社会排斥的 消极影响[3]。具体而言,在低社会排斥情境下,持增 长观的青少年认为不良的人际关系是可改善的,个 体的人格是可发展的,倾向于采用积极的策略来应 对:而持实体观的青少年则认为不良的人际关系及 人的人格是不可改善和发展的,与其采用积极的应 对策略浪费时间做无用功,还不如采用消极的应对 策略更加直接有效[32]。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随 着社会排斥水平的增高,实体观者与增长观者采用 积极应对方式的差异在逐渐减小。仅在低社会排斥 情境下,增长观者比实体观者采用更多的积极应对, 而当社会排斥非常严重时,增长观者采用积极应对 的概率也在急剧的降低。这一结果说明,内隐人格 观是一种人际压力的易损因素,即使是积极因素在 高压环境下也会失去缓冲作用[3],即随着社会排斥 水平的提高,内隐人格观对社会排斥消极影响的缓 解作用将急剧降低。

参考文献

1 Williams KD. Ostracism: A temporal need-threat model.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9, 41:

- 2753-2754
- 2 Williams KD. Ostracism. Psychology, 2007, 58(1): 425-452
- 3 Coyne SM, Gundersen N, Nelson DA, et al. Adolescents' prosocial responses to ostracism: An experimental study.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1, 151(5): 657-661
- 4 Rich G, Adrienne CSC, Nathan D, et al. Validation of the ostracism experience scale for adolescent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012, 25(2): 319–330
- 5 Higgins GE, Piquero NL, Piquero AR. General strain theory, peer rejection, and delinquency/crime. Youth & Society, 2010, 43(4): 1272–1297
- 6 Pharo H, Gross J, Richardson R, et al. Age-related changes in the effect of ostracism. Social Influence, 2011, 6(1): 22–38
- 7 Saylor CF, Williams KD, Nida SA, et al. Ostracism in pediatric populations: Review of theory and researc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and Behavioral Pediatrics, 2013, 34(4): 279–287
- 8 Baumeister RF, Leary MR. The need to belong: Desire for interpersonal attachments as a fundamental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5, 117(3): 497–529
- 9 Kong DT. Ostracism perception as a multiplicative function of trait self-esteem, mindfulness, and 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abil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6, 93: 68-73
- 10 Leary MR, Tambor ES, Terdal SK, et al. Self-esteem as an interpersonal monitor: The sociometer hypothe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5, 68(3): 518-530
- 11 Agnew R. Foundation for a general strain theory of crime and delinquency. Criminology, 1992, 30(1): 47–88
- 12 廖友国. 中国人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元分析. 中国 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 22(5): 897-900
- 13 Compas BE, Connor-Smith JK, Saltzman H, et al. Coping with stress during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Problems, progress, and potential in theory and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1, 127(1): 87–127
- 14 Folkman S, Lazarus RS, Gruen RJ, et al. Appraisal, coping, health atatus, and psychological sympto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0(3): 571–579
- 15 Park H, Paul Heppner P, Lee D. Maladaptive coping and self-esteem as mediators between perfectionism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0, 48(4): 469-474
- 16 Liu W, Li Z, Ling Y, et al. Core self-evaluations and coping styles as mediators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well-bei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6, 88: 35–39
- 17 林丽玲, 刘俊升, 周颖. 儿童中期同伴侵害与自尊之关系: 应对策略的中介效应.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 23(1): 137-140
- 18 Lodge J, Feldman SS. Avoidant coping as a mediator between appearance-related victimization and self-esteem in young

- Australian adolescents.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7, 25(4): 633–642
- 19 冯永辉. 青少年压力与吸烟行为的关系: 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4(1): 77-80
- 20 周永红. 童年创伤经历与研究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6, 24(3): 509-513
- 21 Carver CS, Connor-Smith J. Personality and coping.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10, 61: 679–704
- 22 Lazarus RS, Folkman S. Transac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on emotions and coping.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1987, 1(3): 141-169
- 23 Dweck CS, Chiu C, Hong Y. Implicit theories and their role in judgments and reactions: A word from two perspectives. Psychological Inquiry, 1995, 6(4): 267–285
- 24 Yeager DS, Trzesniewski KH, Tirri K, et al. Adolescents' implicit theories predict desire for vengeance after peer conflicts: Correlational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11, 47(4): 1090-1107
- 25 Yeager DS, Trzesniewski KH, Dweck CS. An implicit theories of personality intervention reduces adolescent aggression in response to victimization and exclusion. Child Development, 2013, 84(3): 970–988
- 26 Dodge KA, Coie JD, Lynam D. Aggression and antisocial behavior in youth. In W. Damon, (Series Ed.) & N. Eisenberg (Vol. Ed.),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 3. Social, emotional, and personality development(6th ed.,). New York: Wiley, 2006. 719–788
- 27 张登浩, 黄莲琼, 董妍. 青少年社会排斥量表在我国青少年中的信效度检验.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8, 26(6): 1123-1126
- 28 汪向东, 王希林, 马弘.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北京: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 1999
- 29 欧阳林依, 许燕, 高树青. 内隐人格观对承诺升级的影响——成功期望的中介效应. 心理学探新, 2018, 38(5): 457-463
- 30 Hayes AF.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2013, 51(3): 335–337
- 31 Rudolph KD. Implicit theories of peer relationships. Social Development, 2010, 19: 113–129
- 32 Chen Z, Dewall CN, Poon K, et al. When destiny hurts: Implicit theories of relationships moderate aggressive responses to ostracis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12, 48(5): 1029–1036
- 33 Li D, Zhang W, Li X, et al. Gratitude and suicidal ideation and suicide attempts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Direct, mediated, and moderated effect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12, 35(1): 55-66

(收稿日期:2019-08-18)